

国性与民德

梁启超文选

王德峰 编选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国性与民德

——梁启超文选

王德峰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国性与民德

——梁启超文选

王德峰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74000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13-026-8/B·33 定价:19.00 元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总序

我们正遭逢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从“中央之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伴随着社会巨变的是思想巨变。思想之变是从“浅层次”开始的，即对“先务之急”作应变的探讨。“先务之急”是西方军事力量进犯难以抵挡，于是第一位的应变思想是“师夷之长技”。造船造炮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接受了“须从社会变革入手”的思路，于是兴起思想巨变之大潮，至今未衰。我们仍在这场社会巨变之中。人们曾经以为，1949年如果说不上是世界历史新纪元之开端，至少也基本结束了中华民族社会结构之巨变。然而近二十多年的经历，特别其中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昭示我们，这场巨变尚不可言其结束。整个这段历史中，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光怪陆离。然而思潮并非思想。思潮往往是诸人群之趋向未必准确、未必恰当的一种表现方式。思潮倏忽更迭，配得上称为思想的却遭冷落。这种情况或许出于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急务。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划界可以作为例证。虽然大家都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中西文化相互作用过程，却不取明朝采纳西历、而取1840年英国炮舰进攻广州为“近代”起点。须知历法向来是中国社会头等大事之一，有时是用以象征政权的！历史分期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对时代本质的感受。在分期基准上，炮舰比历法得到了更重要的关注，证明国

人以“急务为先”作为第一准则。急务为先则思想退后，时间长了，连思想也专注于急务，忘记了自己的根本——求道。大道迷失，后果是对急务争执不已，心气浮躁，冲突愈演愈烈……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现在需要的是阐明大道的思想。阐明不可能凭空出现，思想的事业总要有所依凭。前人的思想对我们总有参考作用，因此需要了解前人的思想。读他们的书是途径之一。为了满足读者当下的需求，有必要从书海中检选出一些思想家的论道之作。

关于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有很多说法，考虑到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上，一个是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现代世界，另一个是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同时进行着中、西文化激烈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不同，所以这两个时期的作品都考虑收录。这段历史事件繁多，人物大量涌现、更迭，思想引出思潮、思潮远离思想，纷繁迷乱，检阅、审理甚为不易。何为“论道之作”？体用不二、道器无间，论器者常常即是论道。强分之，必有毛病。不分，又难免堕入停留于实际急务之窠臼。检选关乎哲学者较为近之。何为“思想家”？或许是最有争议之处。一则思想与思潮不易区分，再则鉴定谁为思想家须高于这些思想代表人物，不用说我们远远不及，历史也尚未进展到足以作出决断的时候。入选的个别作者或许只能算个思潮代表人物，他能否归入思想家之列，只好由读者和历史判定。好在现在并非要对人物作出历史结论，目前的需要只是从前人的书本中引发出我们现在对大道的追寻。这套丛书仅为提供材料而选，其本身不是为了争论，因此尽量不属入我们自己的倾向，各派思想凡有代表性且深思及大道的，一律平等对待，使其有一席之地。我们相信经过多年反复考验的读者自有鉴别能力。

在这个时代，我们优于前人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半世纪的正

反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对照各种思想,思考其是非。这是我们的前人在写下他们的著作时所没有的。如果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还不能超过前代思想家,我们在历史面前真是应该感到万分的惭愧。中华民族已充分觉醒,国力正在迅速崛起。深思的时代正在来临。我们愿借此丛书与全民族同思大道。

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四年九月

编选者序

王德峰

与康有为并称的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事迹是不会被人淡忘的,其政治活动之功过已经有人评说,而且还将继续被人评说。然而,我们现在为他编一部文选,是拿他作为思想家来看待的。

梁启超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贡献何在?这个问题很难准确、全面地回答。他的思想与治学极具个性,而且,正是其突出的个性便已使他在近现代思想界居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梁启超曾将自己与其师康有为作比较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1〕}此言不虚,可谓客观地表达了梁启超治学的个性。治学之个性原不是一个纯然涉及方法的问题,而是内在的精神人格之在外的表现。梁启超生逢乱世,其时,国内政治昏乱,国际上列强虎逼中华,遂使强烈的救亡图强意识萦其心怀而终生不能去,其治学其著述无不围绕寻求民族出路之真理这一大志。然而,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政治人物贤达与奸雄并举,各种势力都有“思想”和“主义”的旗号,而各种

〔1〕 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政治实践的结果又每每蜕变其质，距理想甚远。至于梁启超本人的政治活动就更是屡屡遭挫，捉襟见肘，常陷于困穷矛盾之中。但他绝非一个愿意堕落其志而后袖手旁观的人，而是屡败屡试，虽困窘，虽迷惑，却仍然锐意进取，以为责任不可贷，希望不可泯，大道不可不求。这种以对民族的责任而问路求学的精神经常洋溢于他的讲学和著述之中。所以，他才“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梁启超在一九二〇年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对自己在思想界的作用作过评价，他声明这种评价是“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1〕。且不论这种个人的自我评价能否做到“超然客观”，笔者在此只拣其可以成立者略述一二。

梁启超自称“新思想界之陈涉”，破坏力不小。这一评价大致确当。他初时在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对其学识极为钦佩，然亦非全盘接受，却是“时复不嫌于其师之武断”，对于康有为以神秘性说孔子，亦不谓然。后来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时人附和者甚多，而梁启超屡起而驳之，认为这种做法最大的危害在于“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2〕。他以“陈涉”自任，即是以开思想自由之路为根本要求。今人之不甚了解梁启超者，常因其一生主张珍视中国精神传统，特别是作为这种传统之表述的孔子思想，而斥责其为革新在表、守旧在里。此见实谬。梁氏之为“陈涉”，表里不二。例如，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他就曾力辟之，坚决反对那种以为西方人除了制造、技艺等等之外别无学问的看法，大力提倡“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3〕。他认为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学术著作方面当时所存在的严重不足是晚

〔1〕 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 同上，第71页。

〔3〕 同上，第73页。

清思想运动的一大不幸：“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觥，汲而易竭，其支绌天裂，固宜然矣。”〔1〕倘若他真以为对既有国学中的精神内容作一番重新梳理即足以满足时代的要求，又如何可能认为西方思想之未能真正输入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思想运动所以“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2〕的原因呢？

梁启超对自身的另一评价也是可以成立的，即“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随有所见，随即发表”，“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3〕。他自己说，“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4〕前后矛盾，固是缺点，特别于欲问学于梁启超者易生不知所适之感。然思想之沿革本与社会之运动、变迁不相离。梁启超作为思想家而论，确非蔚然成大家、成大师者，然其思想轨迹之如此密切关涉近现代中国之变迁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恐又非他莫属。这反而成为其一大优点。读他的文选（如果选的角度适当的话），今天的读者自可得到从思想伏流之一端去体会中国社会近现代历程之精神底蕴的大益处。梁启超对自己的这一特点亦有辩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5〕其意思便是，既为“陈涉”，便难免于粗率。然自知粗率，且进而敢于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不计为世人诟病，是他的一个十分可贵之处，也表明他之治学，原非为学术而学术。他自白于世人曰：“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但是，

〔1〕 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2〕 同上，第80页。

〔3〕 同上，第70、73页。

〔4〕 同上，第73页。

〔5〕 同上，第73页。

“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1〕。

不过，若真以为梁启超一生思想数变而一无定见，只是一名“陈涉”而已，那也大错了。在阅读了他发表于不同时期的大量著述之后，我们仍可发现贯穿他一生思想的主线和基本见解。这主线和见解可以简括而言之，一曰“国性”，一曰“民德”。他关于“国性”的思想以及对于中国人之“民德”的检审与思索，终生坚持。他从这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和面对民族生活之现代化要求时所具有的生命力。

何谓“国性”？按梁启超的原意，指的是一个民族赖以自立于天地之间的本性：“苟本无国性者，则自始不能以立国。国性未成熟具足，虽立焉而国不固。立国以后而国性流转丧失，则国亡矣。”〔2〕然此为何种本性？又如何形成？梁启超说：“国性无具体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之駘合，群交之渐剧，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其信条具有大威德，如物理学上之摄力，搏挽全国民而不使离析也。”〔3〕由此言观之，所谓国性，是指一个民族在历时漫长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渐渐形成起来的精神传统（“无形之信条”），而这传统乃是该民族所以能够自立自存的根本性质。其力量既由漫长岁月的社会生活于不知不识中养成，故既不可创造也不可蔑弃。圣贤哲人可以体会它，阐发它，或指其弊端而倡言改良，却绝无法废除或重造。可见，梁启超所说的“国性”，作为精神传统，并非存在于圣贤之书上的言辞学理，亦非现实中的典章制度，而是隐匿于学说与制度背后并支撑着这些具象之物的民族精神，它活生生地存在于民族生活中，是一定民族之成员所以不同于

〔1〕 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2〕 见《饮冰室文集》第29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3页。

〔3〕 同上，第83～84页。

其他民族成员之所在。由于对“国性”之存在确信不疑，梁启超对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冲突乃至弃取问题的种种讨论，便有了一个始终未曾动摇的立足根基。对于梁启超国性观的正误得失以及他从国性观出发而对种种问题所作的具体议论之适当与否，本序不可能也不应该详加讨论，应该留待读者自己去阅读，去思考。

梁启超的“民德”概念则较为简明，指的是民族成员之个人人格，或曰“国民品性”。梁启超在民德问题上先后有过大量论述，可见对之关注之甚。在他看来，民德是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时人往往热心于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采西人之长以补自己之短，而不知更为紧要的是须在国民品格的改造上下功夫。他在《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一文中写道：“一国之所以能立于大地而日进无疆者，非恃其国民之智识也，而恃其品性。……印度人之于哲学文学科学美术宗教，其优胜于英人之点甚多，而二万万之印人，遂为区区极少数英人之奴隶……由此观之，论政而归本于人民程度，固是矣。论人民程度而以智力为标准，其去治本则犹远也。”^{〔1〕}那么，他所要求的“治本”是什么呢？是训育出纯良的民德，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孔子思想中犹应在今日昌明之处，无非在此。但是，梁启超并非视孔子伦理思想为今日导养民德所可凭藉的内容之全备，而是视其为教化的根柢之资。至于西方人因重个人权利与自由而生发出来的“公德”，也是他所十分重视的。所以，他在《新民说》一著中专门论述公德与私德之区分，并且强调西方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公德是中国人应该承认和学习的：“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

〔1〕 见《饮冰室文集》第30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9～40页。

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梁启超之意十分明显：以儒家立身处世之道为本，为民德之根基，再采补其本无（“公德”）而新之，是为“新民德”。这样的融会中西伦理传统的道德改革有无现实的可能？这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大难题。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梁启超自谓其思想“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2〕对于前半句，固可同意；对于后半句，恐怕要依“建设”一词之意义而定。笔者愿意指出：未必只有对问题给出一确凿之答案，或使众答案成一体系，方可言“建设”。究极而言，哲学的思考永远不会达到确凿的答案。梁启超在一生的思索中，敏锐地提出了种种问题，并且为解决问题作了种种探求，从而留给今人以重要的思想资料，有助于我们的继续前进。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种建设吧。

附志：本文选所收诸篇，除《在中国公学演说》一文外，均选自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在中国公学演说》一文选自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版）。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于上海淮海路寓所

〔1〕 见《饮冰室文集》第4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5页。

〔2〕 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目 次

编选者序 王德峰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1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6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节选)	11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	18
自由书(节选)	25
少年中国说	32
新民议(节选)	38
新民说(节选)	41
儒学统一时代(节选)	66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77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87
服从释义	92
说希望.....	101
余之死生观.....	106
国家运命论.....	116
中国道德之大原.....	126
中国立国大方针(节选).....	134

莅佛教总会欢迎会演说辞·····	149
国性篇·····	151
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	155
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	162
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	
明之其道何由·····	167
复古思潮平议·····	175
国民浅训(节选)·····	183
欧游心影录(节选)·····	195
在中国公学演说·····	221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224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236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245
什么是文化·····	254
中国历史研究法(节选)·····	261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300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310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317
人生观与科学·····	325
儒家哲学(节选)·····	331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务治事者，虽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务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补破衲，愈补愈破。务治事者，用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务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及其究也，有不受节制，出于所防之外者二事，曰彝狄，曰流寇。二者一起，如汤沃雪，遂以灭亡。于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则适足为自蔽之具而已。梁启超曰：吾尝读史鉴古今成败兴废之迹，未尝不涓涓而悲也。古者长官有佐无贰，所以尽其权，专其责，易于考绩。汉世九卿，尚沿斯制。后世惧一部之事，一人独专其权也。于是既有尚书，复有侍郎，重以管部。计一部而长官七人，人人无权，人人无责。防之诚密矣，然不相掣肘，即相推诿，无一事能举也。古者大国百里，小国五十，各亲其民，而上统于天子。诸侯所治之地，犹今之县令而已。汉世犹以郡领县，而郡守则直达天子。后世惧亲民之官，权力过重也，于是为监司以防之。又虑监司之专权也，为巡抚巡按等以防之。又虑抚按之专权也，为节制总督以防之。防之诚密矣。

然而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长官，犹惧不得当，无暇及民事也。股万姓脂膏，为长官苞苴，虽厉民而位则固也。古者任官，各举其所知，内不避亲，外不避仇。汉魏之间，尚存此意。故左雄在尚书，而天下号得人。毛玠崔琰为东曹掾，而士皆砥砺名节。后世虑选人之请托，铨部之徇私也。于是崔亮裴光庭定为年劳资格之法，孙丕扬定为掣签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而奇才不能进，庸才不能退，则考绩废也。不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则吏治隳也。古者乡官，悉用乡人。汉世掾尉，皆土著为之。盖使耳目相近，督察易力。后世虑其舞弊也，于是隋文革选，尽用他郡。然犹南人选南，北人选北。明之君相，以为未足。于是创南北互选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可到官。非贪污无以自存也。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而官为缀旒也。古者公卿，自置室老。汉世三府，开阁辟士，九卿三辅郡国，咸自署吏。所以臂指相使，情义相通。后世虑其植党市恩也。于是一命以上，皆由吏部。防之诚密矣，然长佐不习，耳目不真。或长官有善政，而未由奉行；或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见也。古者用人皆久于其任，封建世卿无论矣。自余庶官，或一职而终身任之，且长子孙焉。爰及汉世，犹存此意。故守令称职者，玺书褒勉；或累秩至九卿，终不迁其位。盖使习其地，因以竟其功。后世恐其久而弊生也。于是定为几年一任之法，又数数迁调。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礼者使之掌刑。防之诚密矣。然或欲举一事，未竟而去官，则其事废也。每易一任，必经营有年，乃更举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盘踞不去，世其业者，乃在胥吏。则吏有权而官无权也。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汉世亦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属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议国政。所以通下情，固邦本。后世恐民之讪己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戾，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者三公坐而论

道，其权重大，其体尊严。汉制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盖君则世及，而相则传贤。以相行政，所以救家天下之穷也。后世恐其专权敌君也。渐收其权归之尚书，渐收而归之中书，而归之侍中，而归之内阁。渐易其名为尚书令，为侍中，为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平章政事同三品，为大学士。渐增其员为二人，为四人，乃至十人。渐建其贰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协办大学士。其位日卑，其权日分。于是宰相遂为天子私人。防之诚密矣。然政无所出。具官盈廷，徒供画诺。推委延阁，百事丛脞也。古者科举皆出学校。教之则为师，官之则为君。汉晋以降，犹采虚望。后世虑士之沽名，官之徇私也。于是为帖括诗赋以锢之。浸假而锁院，而搜检，而糊名，而誊录，而回避。若夫试官，固天子近侍亲信之臣，亲试于廷，然后出之者也。而使命一下，严封其宅焉，所至严封其寓焉，行也，严封其舟车焉，若槛重囚。防之诚密矣。然暗中摸索，探筹赌戏，驱人于不学，导人以无耻，而关节请托之弊，卒未尝绝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徒使无忌惮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为一网打尽之计也。古者疑狱，泛与众共，悬法象魏，民悉读之。盖使知而不犯，冤而得伸。后世恐其民之狡赖也。端坐堂皇以耸之，陈列榜扬以胁之。防之诚密矣。然刁豪者益藉此以吓小民，愿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会例案，上下其手，冤气充塞，而莫能救正也。古者天子时巡，与国人交，君于其臣，贱亦答拜。汉世丞相谒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恐天泽之分不严也。九重深闭，非执政未由得见。防之诚密矣。然生长深宫，不闻外事，见贤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则主德必昏也。上下睽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也。凡百庶政，罔不类是。虽更数仆，悉数为